

谈柳青的早期创作*

陆 耀 东

有些作家,创作起点即是顶点;更多的作家,则是经过顽强的努力,艰苦的探索,一步一步向着艺术高峰攀登。对后一类作家,我们如果能沿着他所走的创作道路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那么,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这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正确的理解,而且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对于其他作家的创作,也有助益。

柳青同志从开始写作到创作《创业史》,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

柳青同志原名刘蕴华,一九一六年出生于陕北吴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幼小时起,耳濡目染,了解了旧中国农村的一些情况。少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还在高小和初中念书时,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的领导下,宣传、鼓动农民抗租抗税。一九二八年,当他十二岁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反动派厉行法西斯统治,和柳青同志一起战斗的革命同志,有的被打入监牢,有的被迫流亡,有的潜入农村……。柳青同志在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以后,不得不回家种了半年地。这半年,他自然感到很寂寞,很苦闷,但是,由于亲身参加了繁重的农业劳动,对他后来描写庄稼人,却大有好处。

革命的烈火在柳青同志心灵里燃烧。一九三四年,他到西安进入高中学习,由于爱好文艺,尝试着用文艺作武器,为革命斗争

服务。一九三五年,积极地投入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担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逐渐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九三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陆续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后,曾在西安临时大学短期学习过。一九三八年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次年,进入敌后,和英雄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在一起,同日本侵略军战斗。

柳青同志在文苑里崭露头角,是在三十年代后期。

和三十年代许许多多年青的革命作者一样,柳青同志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党的哺育、抚爱;而且,他们都是在革命红旗下,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他们都怀着炽烈的革命热情,将写作与革命紧密结合,创作为了革命,革命又促进了他们的创作。

柳青同志的第一个小说集是《地雷》它收集了作者抗战前期的作品。

《误会》(1939年8月)、《牺牲者》(1940年11月)、《一天的伙伴》(1941年1月)、《废物》(1941年5月)都以我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为题材。作者的意图,主要是想描写前方部队“一些令人难忘的同志”的形象。这些作品,都重视描写、歌颂先进人物和新英雄人物。《误会》通过某医院的一个“长嘴巴”伤员对来这

* 本文为《柳青的创作道路》的第一节。

个地区进行考察的“我”的误解，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伤员热情直率、多嘴有趣而又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思想性格。伤员在饭铺里同“我”相遇时，开始很热情，很客气。在闲谈中，“我”问他怎么挂彩，他讲得很详细；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迟疑地说：“不是”。“我”为了转移这不该问的话题，问他们支队里有多少人。伤员这时怀疑“我”是汉奸，借故抽身回医院，叫人把“我”带到政治委员那里去审问。最后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一个普通的战士，有这么高的革命警惕性。读者“借一斑而窥全豹”，可推见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面貌。《牺牲者》集中歌颂童工出身的年轻战士马银贵。马银贵十六岁加入游击队，十七、八岁当了八路军战士。入伍后，推迟婚期，主动要求上前线。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牺牲前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还不是个共产党员”。他为了不被敌人俘虏，直端端的爬进了汾河。事迹感人至深。马银贵，在那民族危亡的年代，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废物》则具现了一个可敬的老战士——养马员王得中的身影。他虽已年迈，却不肯离开八路军。有一次，情况极其紧急，王得中实在走不动了，他手里拿着手榴弹，“有三个勇敢的日本士兵来活捉他，而在他们到他身边时，炸弹爆裂开来，四个人同归于尽”。《一天的伙伴》赞扬了八路军的一个运输员。这个运输员父亲是坏人，但他从小赶骡子，给八路军当运输员后，对工作对部队感情深。嘴已被骡子踢歪了，住了两个月野战医院，伤犹在，仍乐意照旧干运输员工作。生活苦，但他不嫌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这几个短篇，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表现了八路军这个战斗集体的英姿：在这个集体里，人们忠于祖国忠于革命，为了斗争的需要，他们洒尽鲜血心也甘，而对于敌人，则是同仇敌忾，冲杀在前；在这个集体里，人与人之间是革命同志的亲密关系；这个集体，有

着铁的纪律，又有充分的民主。读了这些作品，我们情不自禁地会说：多么好的人民，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好的军队！

柳青同志在这一时期写的其他几个短篇，如《地雷》（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故乡》（一九四二年三月）等，是以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地雷》生动地描绘了青年一代进步农民在新天地里展翅翱翔的形象；细致地逼真地表现了老一辈思想保守落后农民的变化，他们在新生活的激流中，洗涤着思想上的灰尘。它告诉读者，抗日根据地农村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一代新风在形成。《在故乡》显示出：根据地农村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只有象七老汉那样的懒惰者，寄生虫，才无法生活下去。

此外，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日《解放日报》的小说《被污辱了的女人》，柳青同志以激越的心情，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无耻罪行。

对柳青同志抗战前期的作品，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国当时整个文学创作全景中去认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在抗战前期，茅盾、巴金、老舍等老一辈杰出的小说作家，都发表了长篇巨著和精美的短篇。一九二九年登上文坛的张天翼，和三十年代出现的著名小说作者叶紫、沙汀、艾芜、姚雪垠等，这时创作甚丰，且有力作。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都不熟悉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人民的生活、斗争，也就无法写出以这方面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我们也不应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在当时，反映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人民生活的小说，较优秀的当推柳青，刘白羽和丘东平等人的作品（丘东平抗战初期的作品，艾芜的《秋收》，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写的军队都不是八路军、新四军）。从这个意义上说，

柳青的《地雷》更值得我们重视。

上述柳青同志的作品表明：在他创作道路的起点和最初里程中，已具有一些可贵的素质，虽然它还只是萌芽状态，但后来大都有着惊人的发展，以至成了作家作品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成分，成了作家的特长。我以为，这些素质是：

一、严肃的创作态度。柳青同志后来说过：“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不仅表现在他和人民群众在一块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他写作的时候。”柳青同志在抗战前期，就注意接触火热的斗争生活，在生活中向人民群众学习。《误会》、《一天的伙伴》中的“我”，虽然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者；但如果说其中有着作者自己的投影，则是难以否定的吧。因为作者对人对事的评价和感情判断，都是通过“我”表达的，“我”的身份与作者也几乎一样。《误会》中的“我”，被休养员误认为“坏人”，在寒冷的冬夜，被带到医院盘问，当弄清了真相之后，那个“长嘴巴”休养员上前向“我”表示歉意：一面说：“对不住啦——同志！可是都是为了防坏蛋”；同时，在暗中找寻“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作品结束时写道：

在那落着雪的夜间，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温暖的——不，乃是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温暖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埋怨，没有半点不愉快的感觉，反映了“我”也表现了作者的精神境界。“我”和休养员一样，最关心的是革命的利益，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柳青同志在生活中，总是把自己看作是革命队伍里的普通一兵，不摆“文化人”的架子。这一点，在《一天的伙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作品中的“我”与其他带有某些个人主义杂质的知识分子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对运输员，不是取笑，不是怀疑，而是接近他，了解他，跟他谈心。这种态度，表现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应有的革命品质。

柳青同志对待创作，反对粗制滥造，反对以此沽名钓誉。发表作品和出版集子都很慎重，态度相当严肃。他在《地雷》的《后记》中说：

八年抗战中，我前期曾到前方部队的营连里工作过，“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时回到后方，“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二年）以后，又跑到乡村政权里去了，其间认真的坐在屋子里工作的时间才一年多。……我写的不多，写好的更少，自己愿意集起来惭愧只有这点东西了。……几年来，有过几回机会给我，让我把它们集拢来就教于生活在不同领域的读者，我都自弃地放过去了，原因是我嫌它太单薄……。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柳青同志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写的小说，《地雷》集一篇也未收入。虽然不能说《地雷》没有缺点和毛病，但是，第一，它没有很草率的东西；第二，它没有下列当时文艺界存在着的几种不良倾向的影响：

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于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穿插其间，企图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同时又以“恋爱”迎合落后的读者，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

最后的一种倾向，是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

这几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国统区文艺界，但在抗日根据地也有反映。柳青同志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作者，能抵制这些倾向，是应该赞许的，同时，与作者创作态度的正确是分不开的。

二、探索和表现人们心灵的深刻变化。从柳青同志当时的作品看，他主要是观察、研究两类人（“主要”而非“只是”），一是先进

人物英雄人物；一是旧观念很浓的老庄稼人的细微新变化。前者如《误会》中的长嘴休养员，《牺牲者》中的运输员。后者如《地雷》中的李树元。后一种人物，作者对他们更熟悉，写来也就更为得心应手。李树元是一个落后的老年农民。起初，他看到儿子金宝、银宝参加自卫队进行操练，感到好笑。他认为，打日本鬼子，自卫队没用，要靠八路军。不久，上级要自卫队给八路军运地雷上前线。老头的两个儿子走后，他仿佛失了灵魂似的，惊恐，难过，烧香敬神许愿，希望儿子安全归来。听说我军打了胜仗，老头又幻想儿子特别是灵巧的二儿子、自卫军排长银宝摸一点东西回来。突然，又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他二儿在战斗中立了功，并参加了八路军。这本是一个大喜讯，可老头却感到更大的失望乃至痛心。他向归来的大儿子发脾气，坐立不安，准备去找村长吵架。在去村公所的路上，从前不太理睬他的王三，用尊敬、诚挚的态度向他祝贺；遇到别的人，都以出自内心的亲切语言表示赞扬；到了村公所，人们一反从前对待这个落后老头的态度，把他作为光荣的军属，可敬的长者来接待；他们都称赞老头有个好儿子。这一切，使老头产生了新的想法：“我老了，快入土的人了，啊，这世道还要把我改变一下哩……我一辈子没想到这事情，没认得世面……啊，银宝，你成龙呢变虎呢，你……”。李树元老头虽然还只是开始转变，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从这个艺术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心灵的历程，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在生活中，注意观察现实革命斗争和新的事物对落后的老年农民的微妙影响，注意观察新的观念、道德、心理的萌发。

三、引人注目的叙事才能。这些作品，大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结构自然而又严谨，情节安排颇具匠心。不少作品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使人倍增亲切之感。作者

通过故事或正面或侧面拉开了人物心灵的帷幕。描写事件和人物，都不是平板地顺序写去，《一天的伙伴》用先抑后扬的写法，不断设置悬念，波澜起伏。作品写一支除队长和指导员外均为文化人的队伍，派到前线一个支队去工作。一天，离前线很近了，他们天一亮就整装待发，然而兵站的运输员迟迟不到，许多人气得扬言要打他一顿才甘休。许久许久之后，他来了，原来他昨天出差半夜才归，又得跟牲口喂草料，无论如何不能清早出发。出发不久，运输员赶着骡子前面走，不见了。大家在火热的太阳下赶路，体弱的昏倒了，无法前进。这时，大家怀疑运输员是汉奸，“骗了公家的骡子和咱们的行李跑了”。直到中午已过，运输员又从后面赶来，因他在联络中等候队伍，而队伍则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联络站。情节跌宕中，情趣横生。《误会》利用偶然的巧合，颇为别致。《牺牲者》通过马银贵的战友们的谈吐，构成作品的纵线；而环境气氛的渲染，则仿佛是为情节发表作伴奏的音乐。《地雷》的情节松紧相间，张弛结合，扣人心弦。一般说，这些作品剪裁得当，不流于简单，也不失之繁缛。

世界上很难找到一部十全十美的文学作品，而且可以说，即使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偶而写出一两篇有较多缺点乃至错误的作品，是正常的现象。柳青同志抗战前期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作品，明显地暴露了作者思想上的弱点。《在故乡》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这个短篇写一个革命干部回到久别的已解放了的故乡。他看到故乡变了，前进了；唯有破落的地主的子弟、懒虫七老汉，生活日益困顿。作者把故乡的新变化作为略图、作为背景，而七老汉则是主要的描写对象。如果能正确对待、描写七老汉，也不能说作品没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作者通过“我”对七老汉所表达的感情倾向，是怜悯多于批判。“我”对七老汉虽然不无鄙视和厌弃，但内心深处的怜惜之情更浓。作品特

意渲染“我”与七老汉会见时的“凄惨的气氛”；安排七老汉在人们热热闹闹地过春节前夕死去，这就定下了作家对七老汉主要是同情、怜悯的基调。虽然作品有若干亮色，但就整体而言，不免暗淡了些。由于作品的大量篇幅是写七老汉，因此，尽管作品有这样一段抒情的诗意描写：“我离开这美丽的故乡，渐行渐远；但却时而回转头来，依恋地看看那些山水，树木和人家……”，也不能使读者一扫“悲怆的感觉”。

这篇作品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艺术上的，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思想感情上的问题。我们从一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可以发现：他们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理智上，也知道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一切人、一切社会现象，然而碰上较复杂的人和事，就往往用小资产阶级的悲天悯人的观念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七老汉在政治上并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是有别于地主、资本家的寄生虫；只要自食其力地劳动，他就可以适应新的生活，享受新社会的幸福。然而，他不愿改造，结果只有为人民所唾弃，自己毁灭了自己。这一切，柳青同志当时不是完全不了解，可是，由于七老汉不劳动而导致的生活极端贫困、痛苦，这种可怜的表面模糊了作家的眼睛，因此，在作品中，渲染了七老汉的可怜处境，并以“悲怆”、怜悯的心情，描绘这个应该否定的人物。

《被污辱了的女人》（这是一个“新民小学”教员的讲话）描写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劳动妇女，被日本侵略军强奸、污辱、终至发疯的过程。这位劳动妇女的遭遇，并不是奇特的例外，而是我们民族灾难在她身上的表现。这个短篇，和其他作家抗战时期写的同类题材作品一样，没有深入发掘题材的内

涵，削弱了它应有的思想意义和本来可以具有的撕裂人心的艺术力量。

此外，在艺术上，民族风格民族色彩不够浓，语言，其中特别是叙述语言的句法和章法，存在着欧化的毛病。

柳青同志抗战前期创作上的问题，他后来曾有过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说：

……“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毛泽东同志说有“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及它的许多缺点”。我当作一个文学创作活动者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并无任何贡献，但却接受了许多缺点，如某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和对外国文学皮毛的学习，表现在作品里就是生活的贫乏和语言的欧化。对于一个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缺乏社会发展知识，缺乏思想分析能力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无系统、无批判地读了一些中国和国外的，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作品，不能全部、明瞭、透彻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拿一些生活的印象，东一点西一点的模仿地加工，要写出有生气、有改造性的作品来，是办不到的。

这一段话，有一些自谦之辞（柳青同志很少写文章宣传自己的成绩、优点），过苛之语，但基本上是符合作者的实际情况的。

应该指出：在一九四二年以前的抗日根据地，已有一批文艺工作者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自然，也有相当多的作家还存在着某些毛病，有的同志毛病还较为严重。例如：有些革命作家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了解，不熟悉，有的喜欢猎奇，对生活琐事寄予过多的兴趣；有的创作中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等等。柳青同志当时，基本上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他的创作是健康的，他的创作道路的最初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个别作品的缺点，瑕不掩瑜；而在当时文坛的环境中出现，不仅不难理解，而且更显得微不足道。